

从《上李傅相书》谈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属性

王三峡 付智强

[摘要]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具有历史进程性。通过对《上李傅相书》及其相关史料的分析,可以更加全面地反应孙中山早期的思想特点,明显的改良主义的倾向,浓厚的传统民族主义色彩。其民族主义思想和之后进行的革命活动相统一。

[关键词]《上李傅相书》;孙中山;早期思想;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12)02-0007-04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学术界关于孙中山的思想研究极为活跃,其早期思想研究也是一个热点,但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认为孙中山早期为改良派人士;另一种认为孙中山早期即为积极的革命者;还有人认为他早期思想既非改良,又非革命,还有人认为革命和改良是孙中山思想统一体中两个矛盾统一的方面。学界在研究孙中山早期思想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几篇书信:一篇是《致郑藻如书》,一篇是《上李傅相书》,尤其是后者,研究者甚多。这两篇书信是孙中山早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论作。不过仅就其两篇书信的研究,就来确定孙中山早期的思想属性,显得过于片面。研究中应与当时孙中山的事迹相结合,来全面地解读孙中山的早期思想。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开始悬壶济世的同时,也积极关注着中国政治的走向。1894年孙中山“与陆皓东北游津京”,“至天津时,以李鸿章号为识时务之大员,因作长函遣之”^[1],这就是《上李傅相书》。根据冯自由的记载,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就读时就已经形成了此篇上书的腹稿^[2]。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是有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过程的。

李鸿章素有“东方俾斯麦”之称,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晚清政府所倚重的股肱之臣,主张“师夷长技”,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深有研究,在一篇奏折中他还曾详细地描绘过蒸汽机的原理。李鸿章因病曾接受过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孟生教授的治疗,对西医和香港西医书院颇有好感。李鸿章接受了香港西医书院名誉赞助人的邀请,并答应孙中山与江英华二人进京候缺。这些都使孙中山对李鸿章产生好感,并报以极大的希望,因此才会出现北上投书。

一、《上李傅相书》内容简析

孙中山在“上书”中主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即“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1、“人能尽其才”

关于“人能尽其才”,孙中山分别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一曰“教养有道”,二曰“鼓励有方”,三曰“任使得法”。孙中山有感于教养之道在我中华“日久废弛”,现有的学堂虽有其表,而深乏其实。泰西诸邦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迅速发展,是充分发挥了学校教育的功能。西方学校所设学科全面,各有专师教导,由浅入深,由简及繁。并且通过学业的优劣来选拔合格的人才,做到“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孙中山对西方的人才鼓励机制十分推崇。泰西之国对掌握“一才一艺之微”的人,国家都要“宠以科名”。由国家建立学会和学报用来“萃全国学者之能”,促进社会之士博闻广识。对那些有重大理论创新和新式器物的发明者,国家都会施以重赏,以此来激励人们的创新意识。如此泰西诸邦才能创造出了“夺造化而疑鬼神”的学问。孙中山对泰西诸国的用人制度给与了极高的评价,以致用“唐虞”相比。他认为西方用人能善用人之所长,并能提供一个稳定的职务,各种职务有所分明,对“学而优者则能仕”之人虽有升迁但是不能更换他的工作,这样才能使各行之人做到熟而精。^[3]

2、“地能尽其利”

关于“地能尽其利”,孙中山分别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一曰“农政有官”,二曰“农务有学”,三曰“耕耨有器”。他认为只有官府应设专责之农官,这样才能集中力量修建像水利工程这样

[作者简介]王三峡,女,湖北荆州人,长江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研究(湖北荆州,434023);付智强,男,河南开封人,长江大学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史简帛文献研究(湖北荆州,434023)。

的大型农用设施,组织农民开垦荒地,治理山泽。孙中山还极富远见地指出“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若要有限的土地来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就必须用更加科学的方法来管理土地,所以就要“急兴农学”,来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他还从土壤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的角度来说明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孙中山还注意到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对农业生产的推进,认为“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宜购其器而仿制之”。^[4]

3、“物能尽其用”

关于“物能尽其用”,孙中山分别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一曰“穷理日精”,二曰“机器日巧”,三曰“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他认为要做到“兴物利民”,就要努力探求事物的本质,利用各种事物特性来为民所用。如火油、煤液等的应用,使人们受益甚多。孙中山对电的应用评价甚高,认为“将来必尽弃其煤机而用电力也”。更让人惊奇的是他还天才预见,未来的社会“地物用愈求则人力愈省,将来必至人只用心,不事劳人力而全役物力矣”。孙中山还注意到了机器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认为机器能“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主张应该“推广机器之用”。孙中山还指出搞封建迷信是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巨大浪费,其害甚至过于鸦片,建言“有国者所当并禁也”。^[5]

4、“货能畅其流”

关于“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分别从三个方面做了论述:一曰“关卡之无阻难”,二曰“保商之有善法”,三曰“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他认为中国关卡太繁,官府盘剥太甚,严重打击了商贾的积极性。商贾不兴,则不利于货物畅通,“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孙中山还提倡由政府“保商”,因为商人外出谋生艰苦异常,国家若不加以保护则很难有所大成。他列举了英帝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大的商品市场,就是因为“国政与商政并兴,兵饷以[与]商财为表里”,充分认识到了商人与“一国富强之所关”。而清政府非但“不能保商,而反剥损遏抑之”,这极大地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不利于通货聚财。孙中山还极其重视交通运输业对商品流通的促进作用,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孙中山分别从航运和铁路运输两个方面论述了交通不便对我国商品流通的不利影响,主张及早进行交通运输业的改革,这也是以后其衷心的事业之一。^[6]

《上李傅相书》长达九千余言,和之前的《致郑藻如书》相比,在继承的基础上内容明显更加丰富和完备,对事物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和全面,这反映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完善,其以实际行动实现“医国”的愿望也更加强烈。但从比较中可以发现,其所表现出的政治思想具有前后一致性。

孙中山在此篇“书”中主要提出了四种建言,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从这些主张中很难看出特别之处,因为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这类主张十分普遍。两次鸦片战争的外忧,太平天国的内患,使中国一批开明的地主阶级重新审视中国,为挽救危亡而有所行动。以效仿西方先进技术为主的洋务派打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到18世纪90年代,洋务运动在企业、军事、科教方面取得

了相当的成就,显示出了效法西学的功效。而比洋务派更进一步的早期维新思想此时也开始产生,出现了一批早期改良派人士,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何启、宋恕等。他们广泛引进西方科学,积极鼓吹“变法图存”。

二、早期改良思想

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早期改良人士的思想主张,以作比较。

王韬,1874年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变法》中提出“取士之法宜变也”、“练兵之法宜变也”、“学校之虚文宜变也”、“律例之繁文宜变也”^[7]。

薛福成,1865年写了《上曾侯书》,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寇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八项主张。1875年薛福成提出《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在《治平六策》提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海运、练军实、裕财用”^[8];在《海防密议十条》提出“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水师宜练、铁甲船宜购和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9]。1879年薛福成写出《筹洋刍议》,主要提出反对不平等条约,预防俄、日侵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阐述了洋务运动的理论根据^[10]。

郑观应,1892年完成深具影响力的《盛世危言》,此书提出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的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最早的《盛世危言》共5卷本,包括57篇文章,分别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提出了对中国的改造方案。其中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陈虬,1891年著就《治平通议》(包括《治平礼仪》、《经世博议》、《救世要议》),在《经世博议》中陈虬提出“欲图自强,首在变法”。政治上主张改革官制,“县各设议院,大事集议而行”;经济上主张裕财用、兴制造、奖工商、讲懋迁、开新埠和抚华商;军事上主张变营务、设经略、制兵船、改炮台、编渔团;文化上主张改革科举,“今所习非所用,宜一切罢去”,改设“艺学科”、“西学科”、“国学科”、“史学科”、“古学科”。此外还有“保民”、“治河”、“筹海”、“筹边”诸篇,是一份较为完整的改革方案。^[11]

陈炽,1893年自撰《庸书》,提出核名实、明政刑、兴教养、设报馆、办学校、兴工商等一系列主张。他还主张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以达到“强兵富国”的目的。^[12]

汤寿潜,1890年出版《危言》一书,共五十篇,是一部很详尽的变法著作。主要提出了迁都长安、设宰相制、建立议院、设考试制、任官用人、遣汰冗员、推广西学、鼓励开矿以及修筑铁路、加强海军等主张。社会对此书触动很大,其对戊戌变法也有很重要的影响。^[13]

何启,1872年即与人创办《华字日报》、《寰日报》等报刊,向国人介绍世界大事。同时还发表了《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中国改革之进步论》等有关改革、救国的文章。1887年,何启

为反对曾纪泽救济军事建设在前的观点,在其所作的《中国之睡与醒——与曾侯商榷》一文中指出:“一定要有一支有效的海军,但在此之前必须先进行改革”^[14]。

三、孙中山改良思想分析

从孙中山上书过程中所交往的人来看,主要是早期的改良人士,还有部分洋务派代表。这从侧面衬托了孙中山的改良主张。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些人之所以能够积极帮助引荐孙中山,说明他们的政治主张具有一致性。之前的《致郑藻如书》完成于香港西医学院期间,此时孙中山是何启的得意弟子,两个人交往甚密。“何启在一八八七年写过本小册子,猛烈攻击满清政治,认为中国必先修内政使国内有公平,然后可以得民心,得民心,得民力,然后可以不怕外患。”^[15]而“孙中山读了这个小册子,非常赞同何启的主张”^[16]。由此可以看出何启改良思想对孙中山的影响。从《上李傅相书》中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郑观应思想的影子。1886—1890年间,郑观应退居澳门,在此期间郑孙开始有所交往,并在书信中“研讨改革时政的意见”。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曾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主张,许为孙中山思想的源泉。约在1891年孙中山还写过一篇《农功》,经郑观应修改后收录到其《盛世危言》之中。此篇上书“初稿完成后,首经陈少白阅过”^[17],并加以修改。之后魏恒写信给盛宣怀让其通过盛宣怀帮助把孙中山引荐给李鸿章,信上称赞孙中山“人极纯谨,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言、文字均皆精通,并善中西医术”^[18]。同时郑观应还致函盛宣怀让其帮助引荐。在郑观应家,孙中山遇到了“长毛状元”,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王韬修改后又写信给罗丰禄(李鸿章幕府的洋务文案),让其把孙中山介绍给李鸿章。这一切都能说明孙中山和他周围的这一团体的政治主张具有相互重叠性。“因此,孙中山的请愿书很难说有独到的见解”^[19]。就如胡绳所说:“这样的主张和同时期的康有为上皇帝书实在没有什么两样,比封建官僚的洋务论虽进了一步,但仍是承认现行统治秩序的改良思想”^[20]。

如果单纯的给孙中山早期的思想贴上这样一个“改良”标签,恐怕还有失偏颇。作为一个拥有救国思想的青年,孙中山必定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不能单纯的取其一面,而以偏概全。

四、孙中山革命思想分析

孙中山曾经说过“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立民国之志。”^[21]在其遗嘱中还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22]由此看孙中山也许在1885年左右就有了革命思想。又如1969年罗家伦主编的《国父年谱》载“是年值中法战争爆发,……先生鉴于国事积弱,乃决致力革命,……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以拯救危亡。”^[23]不过此言一出,便遭到吴相湘、罗刚等学者的激烈批判。关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究竟起于何时以及如何产生,由于现存史料的有限,还很

难确切地下一个结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会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

在此,有必要理清革命一词的含义。革命一词最早出于《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它的本意在中国古代是指改朝易姓。如《三国志·吴志·吴主传》:“朕以不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贞观政要·君道》:“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业。”《明史·太祖纪二》:“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后发展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舶来的,王韬的《法国志略》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指法国大革命)。现在革命一词虽然被广泛应用,但其仍然保存着法国大革命所赋予的狭隘意义。与孙中山其后所进行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可以总结出人们对孙中山所进行的“革命”的理解,应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暴力推翻满清;二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这两篇上书中还无法完全看出孙中山有这两方面的思想倾向,必须从其他材料入手来分析,比如在有关孙中山的著作中所提及的一些故事。

孙中山出生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二年,他小时候经常听老战士讲述太平天国的故事,心中对洪秀全有着无比的敬仰,对清王朝也产生了最初的仇恨。此后孙中山也曾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在香港学医时,他还经常说起洪秀全的事迹,称洪秀全为“反清第一英雄”,并自视为洪秀全事业的继承者。章炳麟在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序言中还称颂孙中山为继承郑成功、洪秀全反清事业的民族先锋^[24]。

在香港期间孙中山经常和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畅谈救国救民的理想。其中郑士良是三合会成员。三合会又名天地会,始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地下组织。在与郑士良交往的过程中,孙中山的思想也受到了三合会的强烈影响。历史事实也证明孙中山之后所进行的事业和三合会等社团是有重叠之处的。这也是后来孙中山加入致公堂(三合会的一个分支),接受“洪棍”之职的原因。^[25]

早在1893年,孙中山就曾邀集陆皓东、郑士良、程璧光、魏友琴等人,在抗风轩集会,在他们的相互交往中,曾经试图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宗旨的团体,其目的就是要推翻满清的统治。但因其规模不大,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组织。^[26]

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后的同一年,他便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口号。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指出该会以“振兴中华,挽救中局”为宗旨。兴中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已完全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1895年2月兴中会香港总部成立后,即着手筹划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广州首义标志着孙中山与清王朝的彻底决裂,也是与改良道路的彻底决裂。^[27]

由上述可知,在孙中山积极上书、宣传其改良思想的同时,他还拥有强烈的反清倾向,并在上书李鸿章的同时,已经开始有所行动。这与冯自由的记述是一致的,孙中山在刚写完《上李

傅相书》时,曾对陈少白说:“吾辈革命有二途径,一为中央革命,一为地方革命。如此项条陈得李鸿章采纳,则借此近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事半功倍。”^[28]

孙中山早期反清思想带有明显的传统民族主义色彩,传统的民族主义源于中国由来已久的夷夏观念。历来汉族以正统自居,把其他民族视为“蛮夷”或“胡虏”。雍正皇帝也曾明确表示过“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清朝以满族立国,由建国起就未停止过和汉人之间的斗争。孙中山特别看重民族主义,并把它发展之后列为“三民主义”之首。把民族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首面大旗,在今后的革命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它能够用此比较浅显的道理来号召民众参与革命工作。就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所描写的一样,革命党“个个白盔白甲:穿着崇祯皇帝的素”^[29],目的就是要推翻满人的统治,这说明民族主义在广大人民(尤其是汉人)中有着广泛的基础。

关于孙中山何时明确地以“革命”自称现在还很难下结论,香港科技大学陈建华先生在其《孙中山何时自称“革命党”》一文中有着详细的论述。孙中山或其他作者把孙中山在1885年左右的的活动称为“革命”是出于后设诠释,还是有意前推其革命时间,都有一定的合理程度。因为由传统民族主义出发,到推翻满清统治,再到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系列是一脉相承的,都应该纳入到孙中山所进行的整个革命活动中。关于推翻满清统治的性质,孙中山曾说过“我们推翻满州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方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方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做两次去做。”孙中山把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正体现了他民族主义的独到之处。^[30]

孙中山早期的改良倾向和反满思想在爱国主义上得到有机地统一。当改良道路走不通时,他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并在此道路上作出了辉煌的成就,缔造了新生的共和国。其所有的理想都凝聚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中。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从而来否认其早期的改良倾向。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清晰地看到孙中山救国思想的另一个层面,认识到他早期思想中的革命成分,如此才能还原一个完整的孙中山。

[参考文献]

- [1] 孙中山先生年谱[M].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1929.
- [2][28]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 [3][4][5][6]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7] 王韬.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弢园文录外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 [8][9][10] 薛福成,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11] 胡珠生辑.温州文史资料.第8辑.陈虬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2.
- [12] 杨家骆编.戊戌变法文献彙编.第1册[M].台北:鼎文书局,1973.09.
- [13] 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萧山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汤寿潜史料专辑[M].1993.
- [14] 史扶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15] 胡绳.孙中山革命奋斗小史[M].香港:海洋书屋刊行,1948.09.
- [16][20] 周哲.孙中山[M].上海:生澜书·新知三联书店,1938.06
- [17] 林翠.孙中山传[M].帕米雨书店,1968.
- [18] 李殿元.共和之梦——孙中山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19] (美)史扶林著.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革命先驱.孙中山传[M].吉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 [21] 孙中山著.张小莉,申学锋评注.建国方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22]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23] 罗家伦,黄季陆.国父年谱[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
- [24] 段云章.孙中山[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 [25] 卫聚贤.中国帮会[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 [26]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M].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
- [27] 李守鹏,汪鹏生等著.孙中山全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29] 鲁迅.阿Q正传[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
- [30] 胡钢主编.孙中山思想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Talking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n Yat-Sen's Early Thoughts Based on "A Letter to Li Hongzhang"

WANG San-xia FU Zhi-q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hought has a historical process, it is a hotspot to research his early thought. This article tries respo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n Yat-Sen's thought comprehensively though analyzing "A Letter to Li Hongzhang" and some related historical dates. Through my research, his early thought has an obvious tendency of reformism, but he was not a mere reformer, Sun Yat-Sen's early thought has a character of strong traditional nationalism. Besides, this kind of nationalism is a part of his later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Keywords: A Letter to Li Hongzhang; Sun Yat-Sen; Early thoughts; Nationalism

(责任编辑:黄涯)